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8 日

议程项目 2 和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关于妇女人权的年度全天讨论会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概要

人权理事会根据第 6/30 号决议举行了年度妇女人权问题全天讨论会。本报告所载的讨论概要是根据理事会第 6/30 号和第 47/15 号决议提交的。讨论分为两个专题讨论：第一次的主题是“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第二次的主题是“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病中实现性别平等的社会经济康复”。



一. 导言

1. 2021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人权理事会根据理事会第 6/30 号决议举行了年度妇女人权问题全天讨论会。讨论会分两次专题讨论：第一次讨论“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第二次讨论“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病中实现性别平等的社会经济康复”。¹

二. 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

2. 第一次专题讨论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主持开幕，由国际残疾人联盟人权顾问 Jarrod Clyne 主持。讨论会的嘉宾是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副主席，原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 Ana Peláez Narváez；残疾人联盟“Ravenstvo”(平等)主席 Gulmira Kazakunova；印度尼西亚残疾妇女协会主席 Maulani Rotinsulu。

A. 开幕发言

3. 副高级专员在开幕词中指出，残疾妇女和女孩在权利方面面临障碍，因为性别和残疾交织在一起。尽管残疾妇女和女孩人数很多，估计约为 7 亿，但她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忽视，被排除在影响其生活的大多数决定之外。这增加了她们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的风险。关于对残疾妇女的性别暴力的全球数据有限，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一无形的危机。可查到的数据表明，40%至 68%的年轻残疾妇女在 18 岁之前遭受过性暴力。

4. 有各种障碍的妇女和女孩应成为设计、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和服务的中心，以预防和应对她们面临的暴力。副高级专员强调，必须支持能够代表残疾妇女和女童权利的组织，促进她们的全面参与，并确保她们不仅在残疾问题和机制中，而且在所有问题和所有平台上都有代表。她进一步强调，在国家或国际一级无障碍参加所有公开讨论至关重要，并承认加拿大政府支持使专题讨论能够无障碍参加，提供字幕和国际手语翻译。

5. 副高级专员提到，孤立是增加残疾妇女和女孩脆弱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影响到她们的整个生命周期，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机构中，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在孤儿院等机构中，残疾女孩可能无法利用职能性投诉机制，对精神、身体或性虐待或暴力进行投诉，特别是当她们有沟通或智力障碍时。这些女孩可能被忽视、不被相信或被误解，所有这些都助长了系统和持续的暴力。当她们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时，也可能发生孤立。例如，在农村和贫困地区，残疾女孩往往被视为家庭的额外经济负担，可能导致忽视。对于有身体障碍的人来说，缺乏交通工具往往导致她们被关在家里或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当残疾妇女和女孩从事家务劳动，如取水和收集木柴时，她们可能成为暴力的目标，因为她们被认为抵抗能力较弱。

6. COVID-19 造成的封锁加剧了暴力侵害和虐待妇女和女孩的风险，就像许多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一样。同时，副高级专员承认，一些国家为减轻疫情对残疾妇

¹ 两场小组讨论的网络直播均有存档，可分别查阅：<https://media.un.org/en/asset/k19/k19u5o2na3> 和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m/k1mcs0jfe0>。

女的影响作出了努力。这些努力包括：(a) 在隔离期间创建聊天服务，提供定点和心理支持；(b) 使受害者能够与警方联系和获取信息；(c)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提供帮助热线；(d) 使法律服务以几种语言可获得，让残疾妇女和女孩可及。她最后指出，如果不制止暴力侵害各种残疾妇女和女孩的行为，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5。

B. 发言概述

7. Clyne 先生在介绍专题讨论时指出，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是一种基于权力和控制的歧视形式，是由定型观念和有害的社会规范，以及当今世界仍然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和贬损残疾人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既是侵犯她们的人权和继续使她们边缘化的原因，也是其后果。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和人权条约机构以及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决议都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专题讨论提供了一个机会，讨论残疾妇女和女童遭受的广泛侵权，反思各国在履行尽职义务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审议将残疾权利观点纳入预防性别暴力方案的良好做法。

8. Peláez Narváez 女士谈到了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的紧迫状况以及人权条约机构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的作用。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问题，不仅应是全球妇女议程优先事项，也应该是每个国家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政策和措施的优先事项。

9. 五分之一的妇女患有残疾，妇女的患病率高于男子，为 19%，男子为 12%。其原因包括：妇女和女孩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基于性别的有害和歧视性做法。与残疾男子和非残疾妇女相比，对残疾妇女和女孩的负面定型观念和污名化使她们面临更高的暴力风险。这些消极的定型观念包括幼儿化，认为他们是无性或多性的，认为他们不能自己做决定或照顾孩子，以及他们的证词缺乏可信度。

10. 暴力行为的形式包括身体暴力、法律胁迫、经济胁迫、恐吓、心理操纵、欺骗和错误信息，其中缺乏自由和知情同意是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此外，残疾妇女和女童遭受的一些形式的暴力可被视为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这种暴力行为可包括强迫或非自愿怀孕或绝育；未经自由和知情同意的医疗程序和干预；侵入性和不可逆转的手术做法，如精神外科手术或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孤立或隔离。将儿童与残疾母亲分离是对残疾妇女和女童人权的侵犯。尽管暴力很严重，但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予以打击。

11. 在谈到人权条约机构的工作时，Peláez Narváez 女士说，自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分别通过关于残疾妇女和女童权利的一般性建议和一般性意见以来，这些机构一直在处理残疾妇女和女童的权利。² 这两个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残疾妇女和女孩权利的联合声明(2018 年)，并与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一起发布关于终止对残疾妇女和女孩的性骚扰的联合声明(2020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一般性建议、声明和指导意见中系统地考虑到了残疾妇女问题，特别是在暴力、教

²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18 号一般性建议(1991 年)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 3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

育、就业和保健方面。此外，残疾妇女的状况越来越多地成为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的个人来文的主题。

12. 对 COVID-19 疫情的应对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对残疾妇女和女孩造成了不利影响。Peláez Narváez 女士强调各国为履行人权义务而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包括在法律和政策中保护家庭内外的残疾妇女和女孩；确保与性别暴力有关的所有专门服务具有包容性，并为残疾妇女和女孩所可及；培训在残疾人服务和设施中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预防、识别和报告暴力案件提供信息和通信工具；监测为残疾妇女和女童提供服务或居住的所有服务、方案和机构；确保遭受暴力侵害的残疾妇女和女孩的康复、康复和重返社会；确保发现、调查并酌情起诉所有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的案件；将残疾变量纳入关于性别暴力和暴力侵害妇女的官方数据和统计；并就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童问题进行研究。

13. 缺乏可及性和包容性，阻碍残疾妇女和女孩参加妇女权利受到倡导的活动。例如，这种缺失使残疾妇女不能参加 2021 年 6 月在巴黎举行的世代平等论坛。³ 可及性的缺失，也使她们无法参加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会议，无法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捍卫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参加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举行的活动。

14. Kazakunova 女士介绍了在国家一级促进残疾妇女和女童权利方面面临的具体挑战。经过残疾人组织的长期斗争，吉尔吉斯斯坦于 2019 年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然而，尚未通过和批准实施该公约的计划。2008 年《吉尔吉斯斯坦残疾人权利和保障法》界定了残疾人的权利。然而，尚未创建执行机制来确保法律的执行。2017 年《预防和保护免遭家庭暴力法》没有提到残疾人，因此，国家和地方当局没有收集数据或监测预防暴力侵害残疾人的情况。缺乏数据给人的印象是，残疾人没有遭受暴力。

15. Kazakunova 女士随后提到对残疾妇女和女孩的歧视性定型观念。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9 年的一项研究，一项调查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残疾妇女应该嫁给残疾男子，而残疾男子可以娶一个身体健全的妇女。该研究还表明，六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残疾妇女不能生育健康的子女，因此应禁止生育。此外，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否定残疾人的性行为，并认为他们不需要亲密关系。对残疾妇女和女孩的污名化及其对家庭成员的依赖使她们无法报告针对她们的家庭暴力。即使他们投诉暴力和虐待，规范和报告程序也没有提供确保诉诸司法方面的充分保护或保障。在这方面，她详细介绍了对一名被诊断患有小儿脑瘫的 26 岁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案件。这一例子表明发生这种暴力的具体背景，包括很少机构或组织从事保护残疾妇女和女孩的工作。

16. Kazakunova 女士最后指出，存在严重的障碍，阻碍了在国家一级充分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家庭暴力法》。这些障碍包括缺乏住所、警察不作为、污名化、政府能力和知识有限，以及与 COVID-19 大流行病有关的持续影响。一些政治进程也可能破坏吉尔吉斯斯坦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的承诺。

17. Rotinsulu 女士阐述了在 COVID-19 大流行病背景下应对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行为所面临的挑战。这一流行病直接影响到患有各种残疾—身体、智力、心理和感官残疾—的妇女和女孩。由于残疾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度地缺乏可及性

³ 见 <https://forum.generationequality.org>。

和机会，残疾人受到的影响与其他人不同。例如，缺乏合理的便利阻碍了大多数残疾人积极参与社会。

18. 最容易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的人是自闭症妇女和有听力、视力、心理社会或智力障碍的妇女。由于受害者的行动和沟通能力有限，她们被视为不太可能向当局报告犯罪，这导致了一再和长期的虐待，使她们的情况更加复杂。

19. Rotinsulu 女士还介绍了在印度尼西亚对残疾妇女进行的线上焦点小组和调查的结果。80%的调查答复者偶尔经历暴力，4%的人几乎每天都经历暴力。最常见的暴力形式是羞辱形式的心理暴力(48%)和殴打形式的身体暴力(10%)。遭受性暴力的人报告说，70%是性骚扰，15%是强奸，10%是性剥削；68%的受访者由于污名化和缺乏支持而没有向警方报案。获得法律支助的受害者大多是智力残疾女孩。残疾妇女，特别是盲人妇女，在报案时往往不被警方相信。此外，提供法律支助的残疾妇女面临受害者家属的污名化，他们怀疑她们向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有用援助的能力。接受援助的受害者大多是 11 至 18 岁的未成年人。

20. 在上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Rotinsulu 女士建议：(a) 加强和/或改变政策，(b) 设计转介制度和包容性服务方案，(c) 设计可及和综合的机构关系，(d) 加强大流行病期间的报告机制，(e) 增强残疾妇女的生殖权利和保护自己的能力，(f) 改进性别暴力案件的数据收集系统。

21. 所有嘉宾都强调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的共同特点，即：这种暴力发生在家庭内外和机构内；罪犯往往是受害者的近亲属，包括伴侣、家庭成员、个人护理人员 and 照顾他们的专业人员；歧视性的陈规定见和法律剥夺了她们的法律能力以及他们的身体完整和自主权，包括她们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阻碍了她们平等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从而增加了她们遭受暴力的风险。

C. 国家和观察员代表的发言

22. 发言者之间有一个强烈的共识，即残疾妇女和女童继续极其严重地遭受暴力和虐待，在实现人权方面面临特有和普遍的障碍。一些发言者对普遍存在的暴力侵害残疾女孩行为深表关切，这种暴力主要表现为遗弃、忽视、剥削、胁迫、收容和强迫医疗干预。残疾女孩在性和生殖的保健及权利方面缺乏可及性，可能会增加暴力事件，包括强迫避孕、堕胎和绝育、性暴力和性剥削。残疾女孩还备受有害习俗之害，如处女强奸、杀婴、童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发言者一致认为，COVID-19 大流行使局势严重恶化。

23. 一些发言者建议创建全面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及司法机制，以消除基于性别的歧视和任何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特别关注残疾妇女和女孩，并提供包容性服务。他们提到一些有希望的做法，例如将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包括暴力侵害残疾妇女的措施纳入执法机构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培训单元；通过和修订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医疗，包括基于残疾的绝育。通过和执行相关立法仍然是禁止暴力和为残疾妇女和女孩提供充分保护的关键。

24. 发言者回顾了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包括《残疾人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承担的义务，并呼吁所有尚未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考虑加入这些条约。在这方面，发言者提醒说《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已开放供欧洲委员会非成员国批准。

25. 发言者还强调，需要收集分类数据，以制定对性别和残疾问题有敏感认识和具有变革性的方案。他们呼吁各国解决缺乏分类数据的问题，因为这妨碍了对这一现象的准确理解，并妨碍了对这一现象的根除。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孩的程度不得而知，也可能因普遍报告不足和缺乏分类统计而有所不同。沟通方面的障碍阻碍了向警方适当报告案件；收集证据的方法，如不为残疾人着想的查明犯罪人的方法，也同样阻碍将案件适当地报告给警方。

26. 发言者建议，预防和保护措施包括专门培训方案，不仅针对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而且针对社会服务人员、保健工作人员和从业人员，以及为暴力受害妇女幸存者服务的所有人员。许多发言者敦促各国为基于性别的暴力受害者提供无障碍服务，并培训照顾者，包括残疾照顾者。至关重要的是，从 COVID-19 疫情中复苏，应顾及性别平等，并在各级纳入残疾问题。一些发言者建议将残疾妇女和女童的权利纳入准备和应对紧急情况，包括战争、冲突和人道主义灾害的计划。

27. 发言者认识到残疾妇女和女孩在争取性别平等和人权斗争的前沿发挥的作用，并呼吁体制、在线空间、当地社区和国际论坛进行变革。发言者在赞扬她们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呼吁确保残疾妇女和女童更多和更有意义地参与应对性别暴力的整个周期，从预防到保护受害者、诉诸司法、补救和赔偿以及打击有罪不罚。合乎道德、安全和有意义的参与需要向残疾人组织，特别是由妇女和女孩领导的组织提供支持和灵活的多年期资金。其他发言者强调，需要促进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以确保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和间性妇女以及残疾人的需要和权利得到承认和保护，并支持处理其权利的组织。

28. 发言者认识到必须赋权与残疾妇女和女孩，包括增加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充分和生产性就业及体面工作，以及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可及性。赋权措施还需要更多地了解她们的权利以及她们要求对侵犯其权利的行为进行补救的能力。残疾妇女和女孩应有机会获得道德、心理、社会、保健和安全支助。关于全面性教育在防止暴力侵害残疾人和非残疾人方面的积极影响，一些发言者建议将这一主题列入人权理事会题为“加紧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预防和应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残疾妇女和女童行为”的第 47/15 号决议。

29. 发言者还强调了交流良好做法和分享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另一些发言者建议通过交流技术和调动资源(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履行人权义务。

30. 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提到了一些很好的做法，涉及解决残疾妇女和女孩面临的交叉形式的歧视，防止暴力和机构化，服务的可及性和包容性，以及建设公共实体能力的途径。发言者还询问如何更好地让残疾人组织参与制定方案、法律和政策，是否可能通过一项消除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国际文书，以及如何加强对幸存于暴力的残疾妇女和女孩的责任和赔偿措施。

D. 嘉宾的答复和总结发言

31. Clyne 先生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各国强烈重申其尊重、保护和实现残疾妇女和女童所有权利的义务。他强调各国和观察员在发言中提到的一些要点，包括必须消除消极的陈规定型观念、收集分类数据、提供残疾专项服务和参与决策。他还强调追究责任和赔偿受害者的重要性。

32. Peláez Narváez 女士分享了各国的一些很好的做法。其中包括 2019 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危地马拉为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代表实施的关于将残疾观点纳入与妇女有关的一般政策的培训方案；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的工作：就残疾妇女和女孩面临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开展教育，以促进她们的人权和社会包容；为受暴力影响的残疾妇女和女孩设立的电话帮助热线，如法国从事残疾妇女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设立的电话帮助热线；2020 年西班牙立法改革，禁止强迫和未经同意对残疾人绝育；⁴ 以及一个非营利基金会举办的题为 “No estás sola” (“你并不孤单”) 的每周网络研讨会，以将残疾妇女和女孩联系起来。⁵

33. Peláez Narváez 女士强调采取双重办法的重要性：(a) 在妇女和儿童议程中具体注意残疾问题，(b) 通过残疾妇女和女童自己的组织直接与残疾妇女和女童合作。联合国的有些论坛对残疾妇女和女童尚未可及。如果不能确保她们的充分可及，她们就会被落在后面，妨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她赞扬妇女地位委员会首次考虑就一次届会—第六十六届会议—实现无障碍可及。

34. Kazakunova 女士强调，不仅必须通过法律和政策，而且必须通过创建有效尊重残疾人权利的机制，将其转化为行动。还有一些积极的步骤，例如创建中亚残疾妇女的区域网络。她提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一级努力的例子，包括 2019 年关于对残疾的成见的调查，民间社会组织为幸存于暴力的残疾妇女创建的庇护所，为性暴力残疾受害者设立热线，并为残疾妇女举办夏令营，旨在发展她们的独立生活的生活技能。她指出残疾妇女组织面临的挑战，即缺乏国家的供资和支持。

35. Rotinsulu 女士在总结发言中敦促各国颁布法律，在国家一级禁止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协调国家、区域和国际标准和做法；通过一项关于包容性处理大流行病期间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案件的议定书；收集分类数据；建设家庭处理家庭内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能力。

三. 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中性别平等的社会经济复苏

36. 第二次专题讨论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主持开幕，随后智利妇女和性别平等部长 Mónica Zalaquett Said 致开幕词。嘉宾是妇女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主任；来自乌干达的女权主义者和发展实践者 Maria Alesi；乌克兰性别平等政策政府专员兼欧洲委员会性别平等委员会副主席 Kateryna Levchenko。

A. 开幕发言

37. 高级专员在开幕词中强调世界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经济模式越来越依赖不稳定的就业形式，减少对公共服务的投资，赞成对富人和大公司减税，而不是累进税。外债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剥夺了许多国家投资于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生计保护等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空间。COVID-19 大流行病加剧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损害了妇女的经济安全及其抵御冲击的能

⁴ 见 <https://www.boe.es/eli/es/lo/2020/12/16/2> (西班牙文)。

⁵ Cermi Mujeres 基金会的一项倡议。

力。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一流行病导致妇女参与劳动的情况倒退了 18 年以上。推进性别平等对于克服危机至关重要。

38. 这一流行病在妇女人数过多的经济部门受到的打击最大，妇女也是非正规经济中占失去工作和生计的工人中的大多数，她们几乎得不到社会保障。其中许多妇女是养家糊口的人和基本工人，她们照顾人、生产粮食和管理废物。妇女在劳动力中的参与率继续下降，下降速度比男子快，15 至 29 岁的年轻妇女离开劳动市场和教室的可能性是年轻男子的三倍。高级专员承认疫情期间妇女和女孩吸收了大部分护理需求，牺牲了她们对就业的保留和恢复以及她们的生计和教育，她指出，妇女对护理贡献的经济价值相当于 11 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9%。然而，解决护理工作无报酬问题的应对措施很少。

39. 高级专员重申性别平等在复苏努力中的重要性，并引述秘书长的“最高的愿望：人权行动呼吁”，强调当男女能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促进影响其生活的决策时，社会就会更加强大，更具韧性。然而，妇女还是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她敦促将复苏努力转到制止性别平等中的倒退，建设更包容、公正和繁荣的社会上去。在这方面，她与秘书长一道呼吁制订新的社会契约和全球新政，为所有人创造平等机会，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

40. 高级专员从人权角度阐述了创建新的社会契约的具体步骤：(a) 确保最大限度地现有资源分配给享有最低基本水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所需的优质公共服务，如保健、社会保障和教育；(b) 认识到有酬和无酬护理工作的经济价值；(c) 确保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和责任，消除加剧性别不平等的陈规定型观念和做法；(d) 优先考虑保护和促进面临多重交叉形式歧视的妇女的经济安全的复苏努力；(e) 采取对最落后的人公平的累进税收政策；(f) 通过国际合作，支持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腾出财政空间，投资于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经济复苏；(g) 评估拟议的紧缩措施和债务管理建议对的人权影响；(h) 保护公民空间以及妇女、女孩和不同性别的人参与有关恢复措施的决定；以及(i) 确保她们在人权，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诉诸司法和获得有效补救。最后，她呼吁开展人权经济建设，为人和地球带来一个健全和可持续的未来。

41. Zalaquett Said 女士首先强调这场危机对妇女的影响最大，加深了先前存在的差距：(a) 它使妇女由于封闭措施而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b) 它导致妇女参与工作的人数急剧减少，(c) 它加剧了无报酬工作的不平等分配。然而，妇女没有平等地参与应对 COVID-19 的战略决策。

42. Zalaquett Said 女士对全球趋势和她本国的具体情况作了比较，对上述几个问题作了阐明。她指出，这一流行病导致就业机会急剧减少，全球就业机会减少 1.14 亿个，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比男性多 5%。就智利而言，在这一流行病之前，妇女劳动参与率达到了 53.3% 的历史峰值；然而，2020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降至 41.2%。关于无酬照护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妇女平均每周花在这些工作上的时间为 28.7 小时，而男子为 11.7 小时。在智利，妇女每周在家务上的平均花费比男子多 9.6 小时，在育儿上的平均花费比男子多 10.7 小时。同样，三分之一以上的男子每周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为零，50% 以上的男子花在护理活动上的时间为零。在为应对这一流行病而设立的国家机构中，妇女代表性不足的情况在智利也出现了。

43. Zalaquett Said 女士接着分享了为应对她本国这一令人担忧的情况所做的努力。妇女和性别平等部阐述了复苏政策的参与性办法。它召集了 COVID-19 妇女理事会，这是一个由民间社会、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政界的妇女代表组成的小组，他们致力于制定短期和中期建议，以解决被确定为至关重要的三个领域的危机：暴力与健康、经济复苏和护理。同样，智利成立了 COVID-19 社会圆桌会议，这是一个跨领域工作组，目的是协调和促进针对这一流行病的有效行动，以便将性别观点纳入应对 COVID-19 的所有决定。

44. 此外，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支持妇女重新融入工作界，并为她们的保健需求提供具体解决办法。这些努力包括为雇用妇女和将妇女重新纳入公司提供注重性别的就业补贴，补贴她们的部分薪酬；《保护教养法》，旨在保护学龄前儿童负责人的工作和收入；紧急产后假，包括在健康紧急情况下延长假期。Zalaquett Said 女士还提到了保护补贴，该补贴为妇女提供照顾 2 岁以下子女的资金转账，以支持她们重返工作岗位，并制定了普遍儿童保育法案。政府正在作出的另一项努力是加强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增加妇女的参与，特别是在建筑、采矿和能源等振兴经济的关键部门。最后，她呼吁各国紧急行动起来，发扬创新，以确定和执行具有性别观点的社会和经济复苏战略。

B. 发言概述

45. 妇女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主任说，26 年前，女权主义者和活动家创造了历史，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启发了一种观点，即妇女权利的任何方面都与其他人权一样至关重要。《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的承诺至今一直在回响。COVID-19 的爆发带来了无法预见的挑战，加剧了对实现妇女权利的几乎每一种威胁。例如，即使在这一流行病之前，一些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妇女每天所做的无酬照护工作比男子多 11 倍，这对她们从事有酬工作的机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一流行病将这种不平等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46. 区域主任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危机中抓住机会，更好地重建。他强调，必须实行同酬，加强就业保护，平等分配护理工作，并对护理经济进行定向信贷和投资，以改善对妇女的经济融入。他敦促世界聚焦当前和长期的政策优先事项。在当下，他建议采取政策措施保护妇女护理工作者，包括在第一线的专业人员和在家中从事基本但无报酬工作的人员。为此，应承认所有这些护理工作者都是基本工作者，并保证工作安全所需的条件和设备。他还建议扩大对护理人员的社会保障范围，包括在家中的非正式无酬护理人员。这将需要向低收入妇女和失业的非正规工人提供现金转移、带薪护理假、灵活的工作选择和对前线妇女的育儿支助。然而，就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政策对策而言，在 COVID-19 危机中支持无酬照护的措施很少。在该区域采取的 295 项政策措施中，只有 25 项涉及无酬照护（占措施总数的 8%），只有 29 项涉及妇女的经济保障（占措施总数的 10%）。根据妇女署的一项研究，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的 75 家顶级公司中，只有 12 家（16%）表示它们有政策或设施支持雇员照顾子女或其他受抚养人。

47. 为了实现包容性复苏，必须创建一个强有力的护理经济，以纠正护理工作价值被低估和份额不平等的情况。这需要(a) 投资于基本基础设施，帮助妇女减少从事无报酬工作的时间，例如扩大电力供应，以缩小城乡差距，(b) 刺激市场，将护理经济视为一种实体经济，包括通过提供公共护理，通过雇主提供护理或促

进替代护理模式，以及(c) 在护理经济中创造更多安全、体面的工作机会。在这方面，妇女署启动了护理加速器方案，⁶ 以帮助护理企业家提供可及、可负担和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到 2030 年，将护理经济的投资增加一倍，可增加 2.69 亿个就业机会，需要政府支持才能使这些企业可持续发展。区域主任最后重申，复苏努力必须公平、促进性别平等和具有包容性。他呼吁开展强有力的多利益攸关方运动，促进性别平等和护理经济。

48. Levchenko 女士首先指出，性别平等是政府政策在社会各个领域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她强调将性别观点纳入公共政策的四个关键条件：(a) 维护对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国际承诺，(b) 增加妇女对各级决策进程的参与，(c) 与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和女权组织合作，(d) 在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方面创建和加强多利益攸关方合作。她详细阐述了这些要点，并提到了她本国采取的具体行动。

49. 关于国际承诺，乌克兰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并正在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乌克兰还加入了 Biarritz 性别平等伙伴关系和平等一代论坛行动联盟。关于加强妇女参与决策的问题，Levchenko 女士强调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的暂行特别措施的重要性。乌克兰在 2020 年的地方选举中实行了 40% 的配额，因此，在一些地方议会中，女议员的代表比例从 8% 至 10% 增加到 30% 至 35%。在经济领域也可以采取暂行特别措施，例如增加妇女在国有企业监督委员会中的代表性。

50. 作为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的一个例子，Levchenko 女士提到创建了一个有 5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的题为“平等权利和机会”的平台。关于多机构合作的作用，乌克兰与国际伙伴和民间社会组织密切合作，致力于制订一项 2030 年前国家性别平等战略。在制定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议的第二个国家行动计划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参与性办法。最后，她重申乌克兰承诺将性别平等纳入公共政策的所有领域。

51. Alesi 女士在介绍中强调，实现性别平等的复苏，一个关键支柱是性别响应性筹资。性别响应性筹资不只是为农村妇女的小型项目提供资金，而是从人权视角提供资金，重点是拆除造成和加剧不平等的结构和制度。

52. Alesi 女士详细阐述了如何为性别的平等复苏提供资金。第一，必须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她说，非洲的公共债务目前为 3,500 亿美元，拉丁美洲为 3.3 万亿美元，并指出，当国家负债累累时，它们被迫采取紧缩措施，在偿还债务的祭坛上牺牲公共服务。此外，取消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将使它们腾出资源投资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推动性别平等的复苏。

53. 第二，融资必须有意针对非正规部门。目前，大多数经济复苏计划将妇女排除在外，因为这些计划并非有意针对非正规部门。Alesi 女士说，有人认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没有组织起来，因此很难接触到他们，对此她指出，这些工人往往自我组织成不同的协会和团体，政府如果发挥有创造力，就可以通过这种组织接触到他们。非正规部门的生存依靠妇女的劳动，对它的支持必须辅之以对妇女的社会保障措施。

⁶ 见 <https://seedstars.com/community/entrepreneurs/programs/care-accelerator/>。

54. 第三，Alesi 女士敦促各国制定和实施累进税制度。许多国家的税收制度往往是累退的，继续给低收入者带来税收负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在乌干达，由于对互联网征收 12% 的税，提高了上网费用，妇女被排除在获得对性别平等型复苏至关重要的信息和机会之外。对财富和收入征收累进税将有助于各国政府调动资金，以履行发展义务，而不会使妇女进一步边缘化。她强调，不仅需要在国家一级，而且需要在区域和国际一级进行税收改革。

55. 第四，没有对公民空间的保护，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复苏。如果存在腐败、暴力、公民空间的侵蚀和对民间社会行为者的镇压，就不可能实现两性平等的复苏。如果不对政府实行问责，包括预算支出方面的问责，社会和经济服务的提供就总是会出现崩溃，对妇女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56. 最后，Alesi 女士强调疫苗公正对性别平等型复苏的重要性。非洲只有 0.78% 的人口接种了 COVID-19 疫苗，许多中低收入国家仍然没有足够的机会。尽管意识到债务负担的负面影响，世界银行仍向重债国家提供信贷便利，以便从囤积疫苗的国家的公司购买疫苗。她强调这种做法的不公正性质，并敦促确保中低收入国家的妇女获得疫苗，这是实现性别平等型复苏的一个必要条件。

C. 国家和观察员代表的发言

57. 发言者达成了强烈的共识，即 COVID-19 大流行病导致几十年来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出现重大挫折，复苏努力必须确保性别平等，没有基于性别的歧视，并保护所有妇女和女孩的所有人权。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保护妇女和女孩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消除性别数字鸿沟以及确保妇女和女孩获得可持续和清洁能源，是确保妇女和女孩经济安全和减少她们对未来冲击的脆弱性的基础。各区域的发言者关切，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长期国际标准，包括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以及妇女和女孩的身体自主权的长期国际标准受到抵触。还表示关切，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家庭暴力和亲密伴侣暴力以及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的情况有所增加。

58. 发言者介绍了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为确保性别平等的复苏所作的努力。许多国家已通过或正在制定侧重于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将性别平等纳入国民发展计划的国家战略和政策。还在努力通过具体的融资工具或采用性别响应型预算编制，支持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以及经营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妇女。一些发言者提到努力创建多利益攸关方平台，以促进具有不同背景的民间社会组织和妇女参与决策。其他发言者指出，为促进妇女参与公共决策采取了一些暂行特别措施，如有针对性地对妇女候选人进行能力建设。联合国各实体分享了为支持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查明在实现性别响应型平等复苏方面的差距和障碍而开发的工具和研究。⁷

59. 许多代表团重申其本国致力于妇女经济赋权、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促进妇女和女孩参与决策以及从 COVID-19 大流行病中的性别响应型复苏。更具体地说，各代表团重申本国承诺维护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国际人权文书，包括

⁷ 例子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妇女署的 COVID-19 全球性别对策跟踪系统；人口基金的 COVID-19 人口脆弱性看板；以及妇女署和其他机构，在 COVID-19(2020 年)中为妇女伸张正义。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并重申它们在平等一代论坛行动联盟下作出的承诺。发言者还提到在区域一级作出的承诺，如东盟将性别平等列为 COVID-19 应对和恢复进程的优先事项，非洲联盟指定 2020-2030 年为妇女金融和经济包容十年，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专门针对妇女和女孩数字技能赋权的方案和会议，加勒比共同体制定了一项全面的区域性别平等战略，欧洲联盟复苏和韧性基金强制性规定成员国必须投资于促进性别平等的项目。

60. 发言者提出了实现性别平等型复苏的若干政策干预领域。其中包括收集和使用分类数据；性别响应性社会保障；对资源的性别平等型可及；预防和应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包括通过批准《伊斯坦布尔公约》；全民医保，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心理健康；为女孩和年轻妇女提供安全、优质和包容性的教育；妇女和女孩获得数字技术，作为自主经济活动的基础；促进妇女，包括青年妇女和女孩的领导和政治参与；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包括歧视性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社会规范；促进妇女诉诸司法和刑事司法中的性别平等。发言者呼吁特别关注面临交叉形式歧视的妇女和女孩，如面临年龄歧视的妇女和女孩、那些面临种姓歧视的、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以及身患残疾的妇女和女孩等。一些发言者告诫各国不要以社会经济复苏的紧迫性为借口，限制或削弱妇女和女孩的权利，或让她们停滞不前。还呼吁在复苏努力中考虑到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建议，并加入平等一代论坛行动联盟。

61. 发言者就一些要素向嘉宾提问，包括宏观和微观经济措施，以确保性别响应性复苏和妇女和女孩的总赋权，转变护理经济以促进性别平等，防止对妇女的经济暴力，并建设对未来危机的韧性。还提出了一个关于疫苗护照对加剧不平等的影响的问题。

D. 嘉宾的结论性发言

62. Levchenko 女士在结论性发言中强调，必须采取性别响应性政策，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病背景下的复苏计划中。她重申促进公共生活中性别平等的四个基本条件，即：通过使用配额等暂行特别措施确保妇女参与决策；与民间社会合作并给予支持，特别是妇女权利和女权主义组织，包括那些与基于性别的暴力受害者和其他边缘化妇女群体合作的组织；通过政府、民间社会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制定关于妇女参与的战略文件；以及维护对妇女人权的国际承诺。

63. 在回答提出的问题时，Alesi 女士强调了强制疫苗护照的不公平性质。非洲只有一小部分人获得全剂量的 COVID-19 疫苗，但一些国家却已经开始为动物接种疫苗。在这方面，她强调疫苗护照拒绝承认非洲人是人，剥夺他们的商业机会和他们在全球社会的公民身份。她呼吁非洲国家和其他区域的中低收入国家集体抗议这种做法。作为性别响应性复苏的宏观经济措施，她还建议拒绝公司最低税率 15% 的全球标准。因为这将意味着降低许多国家现有的最低税率，并允许应对这一流行病所需的资金外流，特别是从中低收入国家外流。这种做法最终将进一步排斥中低收入国家的妇女和女孩，她们在发展方面往往被落在最后。

64. 妇女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主任强调多边合作应对这一流行病的重要性。他重申《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作为实现性别响应性复苏的最宏伟框架的价值。他欢迎最近通过平等一代论坛在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工商企业、慈善组织和国际组

织之间创建的国际合作，以及在其行动联盟下作出的大胆承诺，包括关于经济正义和权利的承诺。他建议改革护理经济，扩大体面工作和资源的可及性，并为各类妇女和女孩采取性别关系转型式的宏观经济计划、预算改革和一揽子刺激计划，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最后，他请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入性别平等论坛行动联盟，并致力于全球性别平等运动。
